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4.04.018

隐忧、策略与螺旋式演进：语境崩溃情境下聊天截图的传播实践

袁星洁, 季凯华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 Web2.0时代,手机和社交媒体已然成为用户分享生活的“基础设施”,分享聊天截图成为数字生活的一个部分。通过引入技术可供性的分析框架,以聊天截图为研究对象,发现聊天截图背后技术的内容可供性、传播可供性、情感可供性加剧了信息不可控的困境,使用户的隐私、表达自由等受到损害。用户在语境崩溃情境下与这些可供性作斗争并进行策略性调整,引导着技术的不断完善,期望于新的社交规范、平台规则、法律规制的建立以重获控制感。

关键词: 可供性;语境崩溃;聊天截图;传播实践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35(2024)04-0144-07

Web2.0时代,手机和社交媒体已然成为用户分享生活的“基础设施”。移动端的普及和发展让截图传播更便捷,分享聊天记录的方式已经成为用户数字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与此同时,用户并不知道传播的聊天截图会流转向何方,又会被谁观看,带来哪些意想不到的后果。传播学者丹娜·博伊德提出的“语境崩溃”概念,描绘了在这个情境分离愈发难以实现的社交媒体时代,多重情境的并置和重叠让个人很难管理好自我呈现的困境,很好地概括了这种现象。本文重点探讨语境崩溃情境下基于聊天截图可供性的人与技术互动,尝试解读在语境崩溃情境下自我呈现的控制危机从何而来,聊天截图及其背后技术的可供性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面对技术可供性,用户采取何种行动建构其作为行动者的主体性,技术又对此做出什么反应。如此,人与媒介技术的关系才得以展开。

一 问题的提出:研究缘起与理论框架

(一) 作为新社会情境的语境崩溃

语境崩溃由丹娜·博伊德最先提出,她强调当技术夷平多种语境的边界,将不同语境中的多样受众融为一体时,就发生了语境崩溃(Context Collapsed),其思想资源来自于符号互动论中对“情境”的研究。在欧文·戈夫曼(1959)生活的时代里,情境具有独立性,通过隔离观众、分离情境等方式形成了“前台”和“后台”。梅罗维茨(1985)则从消失的地域里敏锐地察觉到了情境的变化,在电子媒介的影响下,先前戈夫曼时代下情境的独立性已经不复存在,前、后台开始相互渗透融合形成新情境“中台”,人们的行为模式也随之改变。到了社交媒体时代,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情境交叠在一起,情境的融合达到极致。博伊德认为这是平台可供性的必然结果,蕴含了从符号互动论向平台可供性的转向。但在具体的研究中,这种静态的阐释取向往往无法顾及人与技术的关系,相对忽略了行动主体的主动性。学者韦施则坚持了符号互动论的研究传统,认为多重

收稿日期:2023-12-2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220505848310340);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CX20221067)

作者简介:袁星洁(1970—),男,湖南永顺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媒介融合与新媒体研究。

情境的并置重叠,让语境崩溃这种现象本身逐渐成为了一种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新社会情境^①,避免了博伊德二元对立或者二元调和的实际困境,从而得以动态地呈现人与技术的关系。

沿着这种语境崩溃的阐释取向,人与技术都是语境崩溃这一新的复杂社会情境中的行动者,而新的社会情境又在人与技术的互动中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因此,需要将新的社会情境视为人与技术关系建构中的必经环节,并回到语境崩溃的情境中观察技术的使用,进一步讨论人的能动性以及社会情境建构过程中所蕴藏的多种资源与复杂性^②。人与技术的可供性,只有在这一情境中遭遇(encounter)并彼此感知、互动,关系意义的可供性才能建构和生成。

(二) 聊天截图与技术可供性

1. 可供性及其理论面向

20 世纪后半叶,美国生态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提出了可供性的概念。他认为可供性源自主体对效用的主观感知与对象的客观特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它构成用户在特定场所行动的可能性^③。在传播研究中,其被应用于探讨媒介技术对具有特定感知和技能的用户所具备的行动之可能。

可供性视角是一种具有开拓意义的研究视角,旨在重新认知用户与技术的关系。它没有优先考虑技术决定论或社会建构主义的技术理念,而是以生态性(ecological)而非工具性(instrumental)的思路去看待技术的角色,强调社会和技术参与者之间在微观层面的互动。它与二者之间存在本质分野,这种分野首先表现在可供性是相互的而非单向的,用户与技术之间相互建构与影响。一方面,用户感知技术可供性并接受引导^④;另一方面,用户也会基于技术可供性做出相应的社会文化选择。其次可供性对技术要素的评价更为中立、审慎,强调技术的“可能性”而非“决定性”,这些“可能性”也使得技术的诸种实践同时兼具积

极与消极的影响。最后,可供性是动态的、相对的,情境是其中的关键变量。技术带来的行动可能性是否存在以及如何表现,会因行动主体或技术所处的情境差异而不同。因此需要对抽象或具体的技术所具有的可供性进行情境化的分析,以解释特定技术在具体环境下的行动可能性^⑤。

2. 聊天截图背后的技术可供性

聊天截图的技术可供性,生成于语境崩溃情境下人与技术的遭遇与互动中(如图 1)。在此种情境下,技术可供性为用户的聊天截图实践提供了多种可能,具体有传播可供、内容可供和情感可供等,这些可供性引导用户完成聊天截图分享,并产生不同的结果。如在公共事件发生时,承载了一定信息量的截图发布到网络中,很容易激起层层涟漪(传播优势扩散),并迸发出巨大的能量,但同时也可能造成个体对自己内容丧失掌控和隐私、自由受到戕害的结果。需要指出的是,面对技术可供性引发的控制危机,用户并非完全被动,他们会采取抵抗、协商、合谋等多种策略或隐含或明确地与这些可供性作斗争。技术亦会在不断纠偏中提供新的更合适的可供性,继续引导下一轮的主体实践产生新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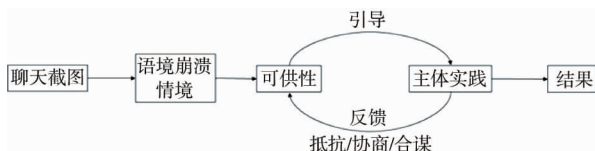


图 1 聊天截图可供性框架逻辑

二 失落的控制:语境崩溃情境下聊天截图技术可供性的隐忧

在众多热点事件中,聊天截图是社交媒体上引爆舆论的传播密码,这得益于背后技术可供性的强大能量。但与此同时,也使这些可供性下的用户面临着能否控制聊天内容传播的危机。聊天截图背后技术的内容可供性、传播可供性、情感可供性等加剧了信息不可控的困境,在可伸缩性、可

①孙梦如,蒋莉,郭沁:《语境崩溃作为信息管理的人际传播过程》,《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②张杰,马一琨:《语境崩溃:平台可供性还是新社会情境?——概念溯源与理论激发》,《新闻记者》2021年第2期。

③曾丽红,叶丹盈,李萍:《社会化媒介赋权语境下女性“能动”的“可见性”——兼对B站美妆视频社区的“可供性”考察》,《新闻记者》2021年第9期。

④王海燕,范吉琛:《数字新闻的时间可供性:一个研究框架的提出》,《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9期。

⑤常江,田浩:《生态革命:可供性与“数字新闻”的再定义》,《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复制性、可传情性下,用户的表达自由、语境的“灵晕”及隐私等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与损害。

(一)传播可供:可伸缩性下被反噬的自由

在用户使用社交媒体的情境下,聊天截图天然具有可分享的传播可供性。用户会将聊天截图分享给亲密朋友,也可以分享给不知名的陌生人。这种传播可供蕴含的强大能量,在包丽、王思聪等聊天记录事件中可见一斑,但也因此带来了新的权力问题。

在无中介的空间中,个体在面对面的交流中保留着对自我呈现的控制。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得个体对自我呈现的控制更为得心应手。例如在微信上的人际互动中,个人可以控制情境,具体来说主要是控制时间和关系网络,从而灵活地进入不同的对话区域,避免矛盾与冲突。但聊天截图的出现让这种控制落空,截图技术可分享可伸缩的可供性,延续了信息的可访问性,实现了可见性的权限转移,用户可以访问在广泛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持久存在的内容,成为当事人眼中“看不见的受众”。

试想一下,与你聊天的人不需要对你有任何事先通知,随时可能对聊天记录悄无声息地截图并将其传播出去,供隐匿于屏幕另一方的无数看不见的受众观看。而对因此造成的“你”形象坍塌,截图者很可能上不必付出任何代价。仅仅是这种想象的泄密风险,就已经能带来一种被监视的压力,造成了权力上的不平等。与此同时,聊天的另一方也会陷入相同的恐惧和不安中,这种“想象中的监视”(imagined surveillance)让社交媒体的用户仿佛置身于韩炳哲笔下的数字化全景监狱。互联网多节点的网状分布结构的可供性,让每一个用户都能够成为监视者,也实现了对所有人的监视。这里的“囚犯”既是受害者,也是作案人。聊天记录随时可能会被公开,但何时何地何人公开都不能确定,这成为一把悬在每个人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正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阐述的,这种规训的权力来自于全景敞

视建筑“观看/被观看”二元统一体的机制:监视者能观看一切,但不会被观看到;而被监视者彻底被观看,但不能观看^①。在此,观看成为一种权力,外部的规则便渐渐变成一种被监视者自律性的约束。被监视者将这种权力关系铭刻于自身,成为自我监视的主体。在失去控制感的困境里,这种想象中的监视会吞噬行动者表达的自由。

(二)内容可供:可复制性下异变的语境

纵观媒介的发展史,无数的技术和技巧被开发出来使瞬间永存。文字的出现让人得以记录事件,而摄影为捕捉转瞬即逝的瞬间提供了工具。然而,正如沃尔特·翁所指出的那样,读写能力的引入不仅仅提供记录,还改变了人类的思维和交流方式^②。瓦尔特·本雅明也曾提到,原真性指的是艺术品当时当地在场的独一无二的存在^③。在机械复制时代,照相技术的诞生使艺术作品的艺术形式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复制,然而它的灵晕却无法再现。写作和摄影都为艺术作品提供了持久性,但也改变了它们所捕捉的结果。聊天截图在可复制性下丢失的“灵晕”便是语境。

聊天截图的可复制性让文本图像化成为一种可能,线上交流的内容通过聊天截图实现了内容可供。聊天截图这种技术物可以比单纯的文字交流提供更多的信息,比如头像、备注、聊天背景、时间、说话习惯、表情包语言、声音之间的互动等,逼真地还原物质性特征,但这并不是说聊天截图能够完全物质性地还原双方对话的语境。罗曼·雅各布森在提出著名的“语言六要素说”时强调,在交流中说话者(addresser)与听话者(addressee)之间的信息(message)传递想要生效,离不开通用的交流符号(code)、交流双方的接触(contact)以及交流中多变的语境(context)^④。人际交往是在一定的语境中发生的,语境是交流双方当时所处的时空环境,包括周围的噪声、交流者的心境,还有即时通讯软件遮蔽的非语言符号等。人们不可能通过聊天截图提供的沉浸式体验,完全窥见更大范围上当事人所处的关系、规范、文化等环境。因

①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版,第227页。

②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

③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④Jakobson R. Closing Statement: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Sebeok T.A. (ed.) *Style in Langua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0, p.353.

此当聊天截图作为公共展演出现时,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语境的异变。有时候,你觉得和朋友的某段对话很好笑,所以截图发到社交媒体中,但观看者可能无法获得同样的愉悦感。究其原因,是原本一对一讲的笑话,此时被摆在了一对多的传播渠道中,相当于把人际传播直接置换成大众传播。这样一来,人际传播的“此时此地”性即语境就被抹平了。在很多社会事件中,聊天截图可复制性下牺牲的语境,让聊天截图前后的场景和背后盘根错节的关系都无迹可寻,等待当事人的则是被误解的命运。

(三)情感可供:可传情性下被侵犯的隐私

聊天截图反映了记录和保存精彩瞬间的情感需求:娱乐、怀疑、愤怒、同情及欣赏等。在社交媒体时代,情感要素成为截图社交行为的主要原因,用户会因为与交谈对象有一段相互认同的对话而选择截图分享,也会因为对一段文字信息存疑而按下截图键。聊天截图在这些时刻成为了情感承载的技术物,实现了情感可供。但与此同时,聊天截图技术可传情性下的截图社交渐渐模糊了公共和私人的界限,正在慢慢侵蚀个体的私人领域。

社交媒体改变了人群之间的互动方式,同时也使亲密对象之间的互动复杂化。个体分享给亲密的少数人看的聊天截图,往往会被公之于更大的公共舞台,使人们感到自己的隐私受到了侵犯。这与海伦·尼森鲍姆所界定的隐私概念相符,即隐私权并不是一种对信息保密的权利,而是一种“个人信息合乎适宜地进行传递”(appropriate flow of personal information)的权利^①。换句话说,隐私是指个人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哪些信息应该被谁在何种情境下接收并知晓,强调的是个人对个人信息的控制力。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用户会通过社交媒体进行隐私设置来控制信息接收对象的范围,以此消解自我表露和情感分享的隐私担忧。但吊诡之处正在于此,尽管用户会在个人交流中尽力维护自己对信息的控制感,以求得心理上的隐私安全,但接收数据和信息的人对信息如何处理,基本上是无法控制的。聊天截图技术的出现,事实上剥夺了个体对自己聊天内容的控制

权,对那些处于聚光灯下的人来说,这种控制权丧失造成的隐私侵犯似乎变得更为稀松平常,这从小报媒体报道名人私人生活的方式看最为明显。它们以受众渴望进入他人后台窥视的注意力为“食”,网民通常把这种观看明星人物私生活的行为称为“吃瓜”。这种戏谑的修辞遮蔽了背后严肃的隐私问题,使越来越多的私人、半私人的聊天记录,因情感需求被截图分享在社交媒体上,进而产生失控的后果。可传情性下的截图社交,正让个体处在一个没有隐私即没有对自己传播内容控制力的社会。

三 抵抗、协商、合谋:语境崩溃情境下用户的三重策略

聊天截图的可供性提供了“失落的控制”的可能性,但这并非意味着社交媒体中聊天截图的动态实践只是由技术可供性决定。相反,用户在语境崩溃的情境下隐晦地或明确地与这些可供性作斗争,去规避失去控制感的不适并以此作为他们技术参与的核心部分。对多样态聊天截屏行为的观察发现,在具有目的性的媒介实践中,个体会将技术的物质性、文化技术系统和日常生活连接起来^②,基于技术提供的可供性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并做出相应的社会文化选择。具体而言,这些策略可从抵抗、协商、合谋等三个维度展开,本文称其为三重策略。

(一)抵抗:“圈地自萌”的时空隔断

在语境崩溃已经成为社交媒体的日常情境时,抵抗聊天截图背后技术的可供性意味着对其所嵌入和参与创造的“社会—技术系统”发起挑战,因此时常会遭到挫折,显得异常艰难。例如用户虽然无法保证聊天记录不被截图传播,却又无法在当今时代做到“因噎废食”,即彻底断绝线上即时通讯。退而求其次,也很难做到停止截图社交的生活方式。因此,这种抵抗姿态一开始就带着几分妥协的意味,仅仅能通过给媒介技术增加限制或减少条件,让技术使用起来不那么方便有效,以此消解可供性。

^①牛静,董嘉,侯艳娇:《社交网络媒体信息传播中的隐私伦理问题探讨》,《东南传播》2015年第3期。

^②宋美杰,陈元朔:《为何截屏:从屏幕摄影到媒介化生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语境崩溃本身就是一种多重情境的并置和重叠形成的冲突情境,让用户很难像人际传播时代那样管理好自己的自我呈现。在这种情境下,保持对抗姿态重获控制感的关键在于分离情境,制造情境的孤立性。因此,用户在微博平台分享聊天截图时,大都会采取仅好友可见或者仅粉丝可见,好友和粉丝的设置实现了戈夫曼笔下的“观众隔离”,极大程度上保证了情境的可控。这种策略在微信朋友圈里表现得更为典型,用户在分享聊天截图时,通过标签框定观众,往往还设置三天可见的时间限制,同时还划分了何人可见和何时可见,实现了一种圈地自萌的时空隔断,规避了由于语境崩溃造成的时空冲突感,将原本需要面对的来自不同时空的“看不见的受众”成功转化为“可控的受众”^①。正如戈夫曼所言:“表演者、观众和局外人都会使用各种技术来维持表演,设法避免可能的崩溃,或者纠正未能避免的崩溃性事件……剧班倾向于挑选忠实的、遵守纪律的、谨慎的成员,并且巧妙地选择观众。”^②这一行为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原有的“表演秩序”,重获了失去的控制感。

(二) 协商:“有言在先”的情境阐明

虽然用户可以通过分组标签、设置权限、屏蔽等方式实现圈地自萌的时空隔断,但这种分隔规则的机械化与扁平化,与个体对语境与自我多维角色的灵活展现、人际交往情境的动态变化是相违背的^③。因为即使是处在朋友圈同一个分组里的朋友,彼此的关系还是亲疏有别的。比如同样是处于同学这一分组中,有些同学和你很亲密,有些同学和你关系很一般,如何处理便会变得棘手。此外,当个体把聊天截图传播出去之后,框定的粉丝或好友就是聊天截图的“共同拥有者”,因此任何一张聊天截图都有可能被阅读并传播至更大的圈,信息的传播范围及其影响无法预知。

抵抗姿态下的策略在社交媒体的可供性下并不能做到计划中的密不透风,社交媒体的机械化设置以及传播的可供性决定了语境崩溃只能被缓

解,而无法被根除,于是偏向妥协的策略因显得更贴合社交媒体的实际而愈发受到青睐。越来越多的社交媒体用户在分享聊天截图时,会详细地阐明聊天发生时的具体情境,通过在截图上添加文字、或者在评论区和图片配套文案上补充详细的人际语境线索和情境语境线索,来与“矛盾、不确切、误导性语境线索”的数字社交语境协商。这种“有言在先”的情境阐明,起到了一种类似于社交媒体上流行的“防杠申明”的效用:既然无法完全消除语境崩溃的存在,便与这种可供性协商,并主动补充情境,以最大可能地减少被误解的命运,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应对策略。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协商策略也会被人利用,起到相左甚至完全相反的作用,一些谣言就是在仅有几张聊天截图的情况下看图说话,用文字补充虚构的情境达成自己的目的。

(三) 合谋:“为我所用”的技术造假

在珍妮·L·戴维斯和内森·朱根森看来,语境崩溃分为语境合谋(context collusions)和语境冲突(context collisions)两种类型,两者在过程和结果上截然不同,最主要的区别是意向性。前者是社会行为者故意瓦解、模糊和扁平化语境的过程,后者则是无意的语境冲突。

面对聊天截图所嵌入和参与创造的“社会—技术系统”,抵抗和妥协都犹如逆水行舟,有着不小的阻力。更常见的情况是拥抱其可供性,主动出击,为我所用,避免无意的语境冲突,有意将利于自己的语境进行勾连。如在“罗冠军事件”中,梁颖在微博上以“加油吧 Vicky 的账号”发布经过截取后对自己有利的片段式聊天记录,塑造了自己的受害者形象,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截图的技术意向结构是切割,这注定了截图的片段化和割裂性。而用户在社交媒体上选择聊天截图分享时往往会掺入个人鲜明的目的性,此时,社交媒体是最合适的实现语境合谋的空间,片段化则是极佳的传播策略。除了这种策略,还有用户瞄准聊天截图物质本身进行技术造假。聊天截图的持

^①吕行,金忻淳:《“何人可见”与“何时可见”:双重语境崩溃下社交媒体用户的自我呈现管理——一项对于微信朋友圈可见性控制的考察》,《新媒体研究》2021年第18期。

^②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11页。

^③黄莹:《语境消解、隐私边界与“不联网的权利”:对朋友圈“流失的使用者”的质性研究》,《新闻界》2018年第4期。

久性、可复制性,塑造了其真实性神话。人们对聊天截图有着一种本能的信任,用户恰恰利用围观者对聊天截图真实隐喻的深信不疑,使用 P 图软件等提供的可编辑性技术修改截图,透支这份信任。类似的做法还有利用即时通讯软件如微信“删除单条信息”这一按钮中蕴藏的低阶可供性,将聊天记录中不利于自己的发言先逐条删除,得到一份“完美”的非真实作品再进行截图。这类主体实践充分显示了用户的能动性,与技术的可供性实现了最大程度上的合谋。但在达到自己目的的同时,技术造假带来的误读与欺骗也将让“失落的控制”愈演愈烈,社交媒体用户则滑入更深的深渊。

四 螺旋式演进:人与技术的互相驯化

在线聊天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当下,聊天截图自然成为互联网时代的“米兰达警告”:你有权在网上保持沉默,但你说的一切都可能被截屏。在多种目的、不同情境的实践中,用户三重策略的技术参与让截屏延伸出更复杂、多变的可能。从本质上讲,人们正在学习如何在中介架构的限制和可能性中生活,以求在日常生活中重获控制感或为我所用。在这一过程中,用户的行动既参与了截屏技术的诠释,又引导着其技术层面的不断完善。

(一) 聊天截图真实性神话的重塑

面对聊天截图可能带来的控制失落,用户与技术开发者都在采取多种策略,努力摆脱失控的状态。比如,相对于只言片语的片段式聊天截图,手机厂商早已开发了“截长图”的功能,可以更大程度地重现语境的复杂性。Snapchat、QQ 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们具备了“阅后即焚”的功能,可以较好地防止私人聊天被随意截图传播。还有一些软件采用了“截图通知”,如果有人已经截屏他们的内容时,该应用程序会通知用户以期保护其对个人信息的控制感。此外,在太多的聊天截图被造假举证后,之前单纯的聊天截图也逐渐被录屏所取代。从截屏到录屏,是一种从静态图片到动态视频的跨越,较好地解决了静态图片易被

造假的窘境等。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聊天截图的真实性神话。

但是重获控制的对手远不只是聊天截图这一技术物本身,技术外壳背后的“社会—技术系统”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因此,新的社交规范、平台规则的确立以及法律的完善势在必行。社交媒体用户应当提高媒介素养,对私自聊天截屏的传播行为表达鄙夷,对聊天截图披露的具体信息持谨慎态度。随着用户媒介素养的不断提高,当仅有的几张聊天截图开始“锤人”时,越来越多的人会首先对聊天记录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打上一个问号,不会急于在语境崩溃的情境下全盘接受可能带有误导性的话语。这是一个值得欣慰的变化趋势,可以窥见一种新的社交规范雏形。与此同时,平台应该通过技术手段,对擅自转发行为进行制约,以及对聊天截图的真实性做出相关标记和提醒。法律也应及时作出调整,对未经允许的聊天截图二次或 N 次传播行为进行规制等。

(二) 人与技术“彼此互相反映”的交互

除去这些聊天截图背后技术的完善,用户在抵抗、协商、合谋策略中,也早已使用一些技术,如微信“删除”可自选的聊天记录、社交媒体的分组或好友可见、聊天记录编辑器等。用户在不同策略指导下的具体实践对技术提供反馈后,技术会在这些反馈的刺激下提供新的更合适的可供性。上一个技术完善的结果又会影响到下一次对聊天截图背后技术的具体实践,从而技术又进行新的调整。至此,用户与技术可供性不再是单向或双向的线性过程,而成为动态的螺旋关系。人们所赖以生存的“基础设施”,便是在这种技术之能动性与人反身性的往复碰撞中,以这种螺旋式的演进方式被重新建构起来。

我们所在的时代是这样时代:一个时代造就了我们,我们造就了技术,技术造就了我们的时代^①。人与技术的互相驯化是没有终点的,无时无刻不进行着“彼此互相反映”的交互。技术的完善,本身就受到用户反身性下具体实践的影响;用户的具体实践,又总是在技术的可供性引导下进行。值得注意的是,具体实践本身带有不同

^①雪莉·特克尔:《群体性孤独》,周逵、刘菁荆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1 页。

的目的性,因此技术的完善也会呈现不同的方向。人们既可以看到聊天截图技术的一步步完善,捍卫着用户对聊天记录的控制感;又可以看到层出不穷的技术手段利于造假,让不可控的焦虑更多一分。这种既矛盾同时又富有张力的技术完善方向,是人与技术关系的现实写照。

结语

从当下聊天截图的传播实践看,虽然重获控制依然困难重重,但这种努力依旧是宝贵的。因为,恰恰是这样的语境崩溃时刻,有利于揭示公众对数字世界生活的理解。在失落的控制第一层(无法控制自己的聊天被截图传播),技术的完善

可以从源头上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而面对第二层(如何不被误解),真正的解决方案或许不只在代码,而在于先进“社会—技术系统”的确立与完善。从控制论的视角看,上文探讨的人与技术可供性的动态关系,预示着用户在具体实践中提供的反馈会成为下一次回环的前馈,指导着技术演变的方向。随着公众对技术认知的积累,以及对实践结果的感知,公众有一天会更深刻地意识到,要对聊天截图背后的技术做出何种改变。待公众能够成为有形政治力量的那一天,截图技术或许可以成为一种“反身性机器”(reflexive apparatus)^①,让重获控制感成为可能。

Anxieties, Strategies and Spiral Evolution: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of Chat Screenshots in the Context of Collapse Scenarios

YUAN Xingjie & JI Kaihua

(School of Humanit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Web 2.0, mobile phones and social media have become the infrastructure for users to share their lives, and sharing chat screenshots has become a part of digital life. By introducing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technology availability and taking chat screensho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t is found that the content availability, communication availability and emotional availability of the technology behind aggravate the uncontrollable dilemma of information, which damages the privacy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of users. Actors struggle with these possibilities or make strategic adjustment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llapse of the context, leading to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echnology, hoping to regain the sense of control by establishing new social norms.

Key words: affordances; context collapse; chat screenshots; communication practice

(责任校对 葛丽萍)

^①张萌:《从规训到控制:算法社会的技术幽灵与底层战术》,《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1期。